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2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 2 2012
(第11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11)

女性劳动力身体禁锢对社会生产力的影响

田富强

(西安文理学院 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5)

摘 要: 宋以后劳动生产力提升并未减缓,但收入停滞,背后是裹足对女性劳动力的身体禁锢。裹足导致女性退出就业市场,强化耕织分工,从事家庭生活和子女教育,导致人口增加和就业压力,在生产总值增加的同时,人均值增加缓慢。

关键词: 人口; 生产力; 女性; 收入

中图分类号: C913.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202(2012)02-0134-07

关于裹足,研究文献集中在历史探索[1]、原因探究[2]、美学考量[3]、放足运动[4-5],还有泛论身体史研究[6]及其审美[7]的论著,对于缠足的经济学研究,偶有涉及对国家富强的影响的历史争论[8],间有在男耕女织的经济史研究[9]中简略提及这一现象的,总之经济学研究文献珍贵且稀缺。能找到的唯一以经济学视野研究裹足,并最经典的研究是邵晓、任保平对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中国农村妇女缠足与性别分工和经济变革关系的探究[10]。鉴于经济视野研究的匮乏,本文尝试研究女性劳动力身体禁锢对社会生产力的影响。

一、身体与国力

综合考虑裹足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裹足负面影响较大,缠足的经济后果是减低了经济发展速度,减少了国民生产总值,降低了家庭总收入。

虽然国外学者对于中国截止清代中晚期的国内生产总值所占世界比重都评价较高,但一般认为宋代以后人均收入停滞不前,并提出各种假说来解释这一现象。无论是什么样的论断,在探讨其有效性之前,首先必须澄清一个前提是:中国自从宋代开始的人均收入停滞不前,作为表象,其实质是劳动生产率停滞不前,是劳动生产率稳步提升,还是劳动生产率稳步下降?

探讨清楚这一命题的重要性,远远高于探讨原因的重要性。因为如果收入停滞背后隐藏的是劳动生产率稳步上升,那么我们所要探究的就不是为什么宋代以后长期劳动生产率停滞不前,而是为什么宋代以后长期劳动生产率稳步上升,基于前提的探讨往往会颠覆所有的后继研究。如果未能深入分析到底停滞还是提升、抑或降低,而假定表面的人均收入停滞不前即反映出劳动生产率的体停滞不前,往往影响以后的所有论断。

二、裹足对经济总量的影响

(一)裹足对于劳动力数量的影响

1. 裹足对有效劳动力比例的影响

裹足普及始于宋,晚清及解放前已基本普及到中下层妇女群体,因定量资料所限,虽难给出宋

收稿日期: 2012-01-02

基金项目: 陕西省科学技术研究发展计划软科学项目(S2010KR503);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资助项目(11JK0187)。

作者简介: 田富强(1972—),男,陕西扶风人,西安文理学院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劳动力.

到解放初的裹足发展曲线图,但是裹足比例的确是从 0 稳步上升到 100%。因此,裹足导致非有效劳动力数量的影响从唐末的 0 增加到占所有劳动力的一半,非有效劳动力数量占全部劳动力数量的比例接近 50%。非有效劳动力数量占有效劳动力数量的比例接近 100%,两者比例近似 1,也就是说真实的劳动生产率 S 与未加区分有效劳动力与无效劳动力条件下的劳动生产率 S'的偏差系数接近 1,人均收入被低估一半,劳动生产率也被低估一半。

2. 裹足对劳动力总量的影响

裹足对于劳动力数量的影响不是单维的,裹足对于家庭的人口观念应该具有一定影响。在夫妻双方从事户外活动的条件下,妻子在家里的时间有限,与子女在一起的时间有限,在裹足之后,由于身体的原因,妇女在家里的时间相对较长,因此即使不能把大多数在家时间用于子女看护,但是毕竟与子女在一起的时间加长,按照边际成本考察,多增加一个孩子的成本不高,夫妇偏向于多要孩子。因此,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夫妇的生育意愿提高。对于劳动力缺乏时代的促进人口数量增加,具有正面影响。

对于人力资源的开发,人口的增加,裹脚功不可没。因为裹足之后,被限定在家庭周围,因此相比较于夫妻同时从事外部劳动,女性留在家里的时间相对较多,跟子女接触的时间增多,虽然不能完全与子女互动,因为还有很多纺织和家务要做,但毕竟能够养育子女的时间增加了。因此,相对于过去生育较少的孩子,现在看孩子的边际成本减少,多增加孩子成为比较合意的选择,因此裹脚促进子女生育率的提升应该符合推测。这样,在古代长期缺乏劳动力、并鼓励生育的时期来说,长期人口增长率较高会不会有裹脚的贡献呢,从宋代开始的人口增加速度变化不定,随着战争陷入低谷,但是清代的人口数量大大增加,有户籍土地税收制度变革导致的瞒报人口逐步恢复户口,如果没有真实的人口的缓慢而稳定的增长,突然多出来巨量人口,是没有基础的。因此,清代以前的大量人口增加,应该是毋庸讳言的。而清代也是裹足最普及的时代。人口与国足的普及的相关,应该多多少少说明了这一问题。

(二)裹足对于劳动力质量的影响

1. 裹足对子女教育总投入时间的影响

人口增加后,近一半的劳动力不能自如参加外部剧烈劳动,裹足会不会必然导致人均国民总产值的降低呢? 目前的资料没有看到降低迹象,国外对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均 GDP 估计,在宋以后是水平的,虽然没有上升很快,但是也似乎没有下降。这怎么解释呢?

原因固然很多,但如果就裹足而论,因上述的原因,裹足虽然不能增加女性教育子女的时间,可能因为上述原因而增加生育,教育每一个孩子的时间减少,但是,如果比较夫妻双方都参加户外体力劳动的情况,因为裹足,女性呆在家里的时间确实延长了,也就是说母亲虽不能对每个孩子付出较多时间教育,但与他们呆在一起的总时间延长。身教甚于言教,子女在母亲的操劳及言行举止的潜移默化中成长起来。因为裹足导致人均 GDP 下降,趋势因上述人力资源投资得到提升,宋代以后,如果裹脚逐步普遍,而本来在愈发普及的裹足下,本该大幅下降的人均 GDP 竟然没有波动,除人力资本提升的补偿,其余部分应归功于劳动生产率提升。

2. 裹足对子女教育平均投入时间的影响

裹足导致母亲与子女的相处时间增加,由于可能导致的生育意愿增加,平均投入每一个子女的时间可能降低,这也是造成总体收入长期停滞的原因之一。

(三)裹足对于劳动分工的影响

1. 裹足强化了男耕女织的劳动分工

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取代了社会上的行业分工,稳定了家的需求与生产结构,从而稳定了国

的生产结构,造成长期的稳定发展。也缓解了劳动力增加对于土地资源需求增加的矛盾。本来会早些进入剩余劳动力阶段,由于一半的劳动力退出田间劳动,缓解了剩余劳动力的出现时机,当然在稳定的同时,也使得西方国家出现的在农业之外探索新的产业的努力推迟。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是强化了家庭分工,形成自给自足的生产消费结构,阻碍了社会上的行业分工及其规模化,从而对于新的技术的采用和推广没有及时出现需求,导致技术创新出现较晚。

2. 裹足调整了不同产业的比重

田间劳动力投入下降,与裹足女性力所能及的工作相关的行业劳动力投入增加。农业的地位略有下降,纺织等产业的地位略有提升,有待于相关文献资料的佐证和支持。

三、人均收入的影响因素

人均收入一般可以认为与劳动生产率相关。假定人均收入为 R,全国总收入为 Q,劳动力人数为 L。则 R = Q/L。生产力稳步增长条件下,劳动力人数未变,但是有效劳动力数量的下降会引起总收入的下降,如果没有析出非有效劳动力,还是按照劳动力的总人数去计算,往往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假定劳动力总人数为 L,有效劳动力为 L1,非有效劳动力为 L2。则 L = L1 + L2。

假定总收入为 Q,有效劳动力的收入为 QI,非有效劳动力的收入为 Q2。则 Q = QI + Q2。

假定有效劳动力的人均收入为 R1,则 R1 = Q1/LI。

如果在计算人均收入的时候,没有仔细区分有效劳动力与非有效劳动力,在统计的时候,不加区分劳动力,只加总劳动力数量,把主要由有效劳动力 L1 创造的收入 QI,当作劳动力总人数 L 所创造,这时假定非有效劳动力的收入可以近似忽略不计,也即

假定非有效劳动力的收入 Q2 = 0,因此总收入 Q = QI + Q2 = QI + 0 = QI。

假定有效劳动力的收入提升主要得益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有效劳动力演变为非有效劳动力主要是因为非经济的原因(比如审美、习俗、婚姻等),随着非有效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的提升,不加区分有效劳动力的收入与非有效劳动力的收入所计算出来的人均收入偏离劳动生产率提升现状的程度愈加明显。

因为在考察劳动生产率的时候,非有效劳动力基本退出劳动市场,从事与生产无关或微弱相关的工作,这样,除了在统计劳动力的时候因为未能区分非有效劳动力而将其统计进劳动力总数外,在研讨劳动生产率的时候,非有效劳动力不具备统计意义。这有点类似剩余劳动力的讨论。与剩余劳动力讨论不同的是,在宋及其以后,假定不存在剩余劳动力,也就是说我们所区分的非有效劳动力不是因为人口过多,劳动力过剩引起的,而是因为非经济的原因(比如审美、习俗、婚姻等)引起的大量劳动力退出主要生产行业的劳动力市场,所引起的非生产性现象。

假定劳动生产率 S 与有效劳动力的人均收入 R1 正相关,关系为 R1 = gS。或 S = R1/g = Q1/LIg。

探讨劳动生产率提升时,如不区分有效劳动力与无效劳动力,则一般考察劳动生产率与人均收入的关系式为 S' = R/g,而 R = Q/L。则 S' = Q/Lg。前已假定非有效劳动力收入 Q2 = 0,因此 Q = QI。则 S' = Q1/Lg。又 L = L1 + L2,则 S' = Q1/(L1 + L2)g。

这样,S = R1/g = Q1/LIg。S' = Q1/(L1 + L2)g。我们计算一下真实的劳动生产率 S 与未加区分有效劳动力与无效劳动力条件下的劳动生产率 S' 的偏离,偏离的系数用 p 表示,并且规定 p = S/S' - 1。

于是 p = S/S' - 1 = [Q1/LIg]/[Q1/(L1 + L2)g] - 1 = L2/L1。

于是,当非有效劳动力的数量与有效劳动力的数量的比值很小,近乎可以忽略不计时,偏差系数接近 0;当非有效劳动力数量逐步增加,并且接近有效劳动力数量时,偏差系数可以接近 1。当偏差系数接近 1 时,人均收入被低估一半,劳动生产率也被低估一半。

这样,国内外所估计的中国人均收入的长期停滞如果因为在估计劳动力数量时未能有效区分有效劳动力数量和无效劳动力数量,而发生严重偏离,甚至偏离一倍,这样,后续的研究结果就必须重新考虑研究基础的重估。

而根据推测,很可能中国在宋代以后的有效劳动力数量逐步下降,而无效劳动力数量逐步增加,至少到近代,严重到无效劳动力数量接近有效劳动力数量,也就是说偏差系数接近 1,人均收入被低估一半,劳动生产率也被低估一半。

四、缠足后的人均收入

前面部分探讨了计算人均收入时因为未曾加入有效与非有效劳动力数量的区分,造成总收入的计算偏离。这里没有考虑非有效劳动力的产出,女性的纺织等活动以及对于人力资源培育的投入,是无法计入总量的,如果按照家庭工业的产出来计算,也考虑到家庭教育的投入,计算结果或有所差异。劳动力的偏差不至于太大,至少不会接近 1。

因 $R = Q/L; L = L1 + L2; Q = QI + Q2$;则 $R = (QI + Q2)/(L1 + L2)$。假定 $Q2 = m * QI, L2 = n * L1$,则 $R = (QI + Q2)/(L1 + L2) = [QI(1 + m)]/[L1(1 + n)] = [QI/L1] * [(1 + m)/(1 + n)]$。前有 $R1 = Q1/LI$。

前面假定不考虑非有效劳动力的产出,即假定非有效劳动力的收入为 0,这里为了全面客观,在可以量化的条件下(虽然家庭妇女缠足之后的生产所得很难进入统计并量化处理),规定考虑非有效劳动力产出的人均收入与不考虑非有效劳动力产出的人均收入之比为 b,则 $b = R/R1$,于是 $b = R/R1 = \{[QI/L1] * [(1 + m)/(1 + n)]\}/[Q1/LI] = (1 + m)/(1 + n)$,现在可以发现,当 $m = n$ 时,也就是 $Q2/QI = L2/L1$ 时,即 $Q2/L2 = QI/L1$ 时,也就是说非有效劳动力产出的人均收入等于有效劳动力产出的人均收入时,$b = (1 + m)/(1 + n) = 1$,即使用有效劳动力产出的人均收入表示全部劳动力的人均收入是没有误差的。

当 $m > n$ 时,也就是 $Q2/QI > L2/L1$ 时,即 $Q2/L2 > QI/L1$ 时,也就是说非有效劳动力产出的人均收入大于有效劳动力产出的人均收入时,$b = (1 + m)/(1 + n) > 1$,即考虑非有效劳动力产出的人均收入大于不考虑非有效劳动力产出的人均收入,使用有效劳动力产出的人均收入表示全部劳动力的人均收入低估了总体收入水平。

当 $m < n$ 时,也就是 $Q2/QI < L2/L1$ 时,即 $Q2/L2 < QI/L1$ 时,也就是说非有效劳动力产出的人均收入小于有效劳动力产出的人均收入时,$b = (1 + m)/(1 + n) < 1$,即考虑非有效劳动力产出的人均收入小于不考虑非有效劳动力产出的人均收入,使用有效劳动力产出的人均收入表示全部劳动力的人均收入高估了总体收入水平。

到底 m 和 n 的关系如何,取决于非有效劳动力产出的人均收入与不考虑非有效劳动力产出的人均收入的差距,在家劳动力的效率高低,如果只着眼于生产性产出,可能不会远高于户外生产收入;但是如果在统计时考虑到教育的投入时间和效率,也就是说如果能够量化母亲对子女的言传身教的投入时间以及教育培训质量,可能会增加非有效劳动力的收入水平。

母教即妇女对家庭教育贡献研究甚众,但量化研究较少。如考虑到长期以来寡母教子等特殊现象,这块的劳动力效率不能低估。

五、缠足与劳动力剩余

缠足到底属于不属于劳动力剩余?缠足是否有效化解了人地矛盾条件下的劳动力剩余现象,值得深入探究。劳动力剩余现象是属于土地不能提供就业机会,又没有其他工商业的就业岗位,而导致的显性或者隐性的劳动力富余。

正是未曾提出的缠足劳动力问题,使其有别于一些国家妇女结婚后离开劳动岗位的习俗。虽然都是离开了主要就业岗位,但是因为结婚离开就业岗位的劳动力仍然具有就业能力,从身体角度看并未丧失劳动能力,同时在人格上也是未曾受到摧残的部分。正如在探讨奴隶制下自由民与奴隶的人均收入一样,在男性和不平等的女性社会里,不加区分对男性和女性劳动力同等对待,加总计算,计算平均的收入,很可能有失公正和科学。剩余劳动力在市场上是流动的,部分人此时为剩余劳动力,彼时为就业者;部分人此时为就业者,彼时为剩余劳动力。难以确指那部分固定的劳动力是属于剩余劳动力。但是,缠足者不同,她们不光是可以确指的具体的人或群体,并且在缠足之后基本固定在这一非有效劳动力群体中。对于她们的指认比较容易,对于这一群体的比例计算和人数统计也不同于剩余劳动力的统计。剩余劳动力是计算岗位缺失的劳动力数量及比例,缠足者劳动力计量只需要从身体特征上就可以分辨,基本与岗位无关,因此,缠足者虽然避免了后来出现的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剧增,推迟其出现,并以变相的方式解决了以后出现的剩余劳动力问题,但是却并不是剩余劳动力。况且在宋有缠足之始,剩余劳动力问题并不一定存在或者即使有也是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因此,在劳动力不足时代提倡缠足,无异于扼杀现有劳动力,从数量上无端减少创造国民生产总值的劳动力,扼杀于少年时代,使其终生不得走上主流就业岗位,只能不得已退而求其次,在家庭里面经营从事纺绩、教育子女的所谓相夫教子活动。

这部分不是剩余劳动力的被动剩余劳动力的离开生产部门,是对于综合国力的巨大削弱。如果要探讨宋以后至解放前废除缠足为止久久不能实现华夏民族的伟大复兴,举其大者,缠足即为一例。每个劳动力赡养的人口数增加将近一半,原来五口之家,两个劳动力,每个劳动力赡养1.5个非劳动力,现在只剩下丈夫一人劳作,赡养人数增加到4个人,提高了1.6倍。缠足之后男性劳动力的赡养人数急剧提高,所谓人口红利根本无法享有。这是劳动力数量减少与人口赡养负担急剧提升所引起的后果。

六、宋以后劳动生产力无提升的假象

为什么说缠足隐蔽了宋以后劳动生产率的逐步提升?如果缠足属于劳动力剩余性质,仍然属于劳动力范畴,则如同数十年来关于中国农村劳动力剩余的探讨一样,不需要特别挑出缠足女性的数量和比例,重估宋以后的人均收入;但是,如果缠足不属于劳动力剩余性质,只是因为社会文化审美婚姻制度等等外在不正常的原因导致的劳动力丧失劳动能力(或丧失主要劳动能力),只是因为其隐蔽性,以及渐进性,长期未能得到劳动力生产率研究者的注意,或者说不易于引起研究者的注意,这样说其属于劳动力范畴,很可能有点牵强附会,因为她们虽然由少到多,由上层到中下层,由被动进入制度化的强迫退出劳动力队伍,但是她们作为受害者,和社会的牺牲品,与数十年来中国农村劳动力剩余劳动力不同,她们基本不具备劳动能力,但是也不是残疾人群体,她们是被致残的群体,致残后主要劳动能力因为身体支撑不足而基本丧失,需要特别挑出缠足女性的数量和比例,重估宋以后的人均收入;如果后一种情况成立,那么宋以后中国劳动力的数量锐减,名义人均收入大幅低估,需要在调查历代缠足女性占女性总数比例变化的基础上,修复历代的人均劳动力收入数据,最高可能被低估了一半,在缠足普及率接近100%的时代,人均收入应该上调一倍,

假定其他条件不发生变化。

七、长期收入停滞掩盖了劳动生产力的稳步提升

在缠足之后实际劳动力减少、名义劳动力数量不变的背景下,为什么人均收入仍然保持不变?这其实引出了一个巨大的秘密,就是补救越来越大的因为缠足的普及而导致的人均收入快速下降的主要来源:劳动生产率的的提升。

宋以后初期,缠足并不普及,女性因为身体残缺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数量不多,比例较小,并且主要局限于上层社会,对于生产劳动的产出影响不十分大,因此要保持人均收入的基本持平,尚不需要太大的努力。但是随着越靠近后期,缠足从上层阶层向中产阶级及下层劳动阶层普及,主要从事生产的下层劳动力阶层,因为社会文化婚姻身体制度的约束,而不得不缠足,对于一线生产的产出的影响逐步加大,并严重制约人均收入的保持。这时,没有因为科技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而导致的效率提高,人均收入不下降是不可能的,这从所有妇女缠足后的主要劳动力的赡养人数增加 1.6 倍可以清楚地看出。因此,来自于上层的审美风尚对于下层劳动阶层的影响最大。因为下层劳动者主要是一线的生产者,迫于身体制度的重压而将家里的妻女缠足,对于家庭生计的影响是远远高于士绅家庭的。士绅家庭的缠足尚不足以对工农商业生产产生巨大影响。因此,只有科技的进步,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的下降,创新成果的推广等诸要素所引起的生产率提升必然有效弥补劳动力锐减对总产出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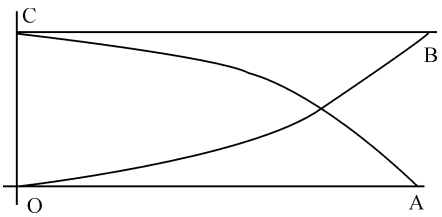


图 1　总体损失与潜在劳动生产率提升相抵消

图 1 是一个简单的关于缠足的总体损失与潜在劳动生产率提升相互抵消的示意图。裹足比率的上升导致了人均收入的损失,假定随着缠足比例上升,女性劳动力创造的人均收入下降的轨迹为曲线 CA,随着裹足稳步增加,女性劳动力创造的收入稳步减少,当裹足比率上升到 100% 时,女性劳动力创造的收入稳步减少为 0。因为名义人均收入不变,人均收入下降部分其实是被劳动生产力增长的部分掩盖或弥补,稳步增长的劳动力轨迹恰好就是裹足比率的上升曲线 OB。

没有增长的人均收入背后,凸显劳动生产力水平提升之快。裹足普及,生产力增长其实加快了。图 2 把因裹足而增加的收入和减少的收入都考虑进去,是上图的详细示意图。图中 DE 是宋以 后长期不变的人均收入,OA表示因裹足而增加人力资本投入所可能提升的人均收入的增长轨迹。OB 表示因为裹足而导致一半劳动力人口退出户外劳动力市场而可能对人均收入造成损失的轨迹:其中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退出户外劳动力市场的损失的轨迹 OG;一部分是在家庭从事纺织等劳动的收益的轨迹 OF;前一部分 OG 减去后一部分 OF 的值就是此值 OB。而缠足对人均收入的损失 OB 大于对人均收入增长的贡献OA,假定OB减去OA等于OC,这就是缠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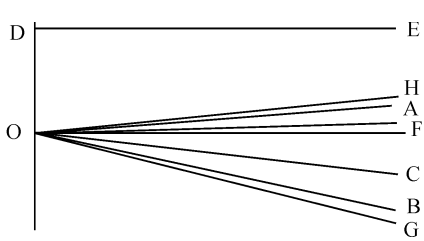


图 2　无增长的人均收入凸显劳动生产力水平提升快

对于人均收入的总的损失曲线,它需要稳步增长的劳动生产率来弥补,稳步增长的劳动生产率来弥补曲线是 OH。

参考文献:

[1] 高洪兴. 缠足史[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
[2] 潘洪钢. 汉族妇女缠足习俗的起因新解[J]. 江汉论坛,2003,(10):44 - 48.
[3] 杨兴梅. 观念与社会: 女子小脚的美丑与近代中国的两个世界[J]. 近代史研究,2000,(4):53 - 87.
[4] 杨兴梅. 南京国民政府禁止妇女缠足的努力及其成效[J]. 历史研究,1998,(3):113 - 128.
[5] 杨兴梅. 被忽视的历史:近代缠足女性对于放足的服饰困惑与选择[J]. 社会科学研究,2005,(2):127 - 134.
[6] 侯 杰,姜海龙. 身体史研究刍议. 文史哲,2005,(2):5 - 10.
[7] 李红春. "身体"的突围及其困境—新时期审美文化主题研究[J]. 天津社会科学,2005,(6):92 - 97.
[8] 杨兴梅. 晚清关于缠足影响国家富强的争论[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19 - 28.
[9] 李伯重. 从"夫妇并作"到"男耕女织"—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之一[J].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3):99 - 107.
[10] 邵 晓,任保平. 妇女缠足、性别分工和经济变革:19 世纪和 20 世纪早期的中国农村[J]. 南大商学评论,2006,(3):163 - 181.

Physical Confinement of Female Labor, the Impact of Social Productive Forces

TIAN Fu-qiang

(*The School of Business, Xi' 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Xi'an* 710065,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Song Pynasty, the raise of labor productivity was not slowed down, but income was stagnated, actually bound feet imprisoned female labor. Footwraps lead women with draw out of the labor market, strengthened the division of farming organizations, and led to the increase in population and employment pressure. As a result, the GDP inereased, the per capita increased slowly.

Key Words: population; productivity; women; income